京津冀一体化不是房地产化

闻一言

“保定近一周多个楼盘价格上浮达10%；涿州一些现房遭抢购；燕郊个别项目单价超过1.5万元……”京津冀一体化的具体规划尚未出台，但北京周边楼市已现“亢奋”。专家指出，应警惕京津冀一体化出现“房地产化”的苗头和趋势。（《新京报》3月31日）

当公众对京津冀一体化还处于琢磨阶段时，精明的开发商已驾轻就熟地开始热炒这一概念。无论是在北京的公交地铁，还是在刚出北京城的公路上，北京周边地区的楼盘广告随处可见，“置业京西迎来最佳历史机会”、“商业地产迎来爆发式增长”等宣传语十分醒目；“一小时热销500套”、“抢到即赚到”等语句更是刺激着购房者神经。于是，不少购房者抢房热情迅速高涨，在保定市某区域相邻的两个热卖楼盘，虽然不是周末，售楼处却人头攒动。其中一个项目的置业顾问郝女士说，上周末两天就卖了近50套，相当于过去两个月的销量；一个项目的小高层的均价达到每平方米7200元，比春节前涨了1000元左右，最近还要再涨300元。根据河北保定市住建局的数据，2013年，当地共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14786套，而今年3月1日至24日就办理了3474套，足见京津冀一体化概念的巨大魅力正在让公众再一次陷入疯狂抢房和购房的热潮中去。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早已习惯了土地财政的支撑并对之形成依赖，他们对于开发商热炒京津冀一体化概念显然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相对于房地产业这块迅速就能吃到的“大肥肉”，如何做好京津冀一体化这篇大文章，如何在治理污染、公共设施、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升一体化的综合水平等问题，则显得艰难而持久。

以目前情势来看，开发商和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打着承接京津功能的名义来大兴土木，以建设配套城市为抓手，以不切合实际的“超前意识”来规划布局新城建设，当购房者纷至沓来并再掀购房热潮时，对房地产投资的冲动，将再一次荡漾在某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心中。由此，可能会导致他们不计成本、不计收益、不计规划地盲目开发，出现“空城”、“鬼城”也在所不惜，以求在京津冀一体化中分得一杯羹。虽然房地产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从治理环境污染到缓解人口资源压力，再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当前的京津冀一体化更注重在功能定位、产业分工、设施配套和交通体系等方面的统筹，而不是强调某地的高速发展，更不是以做大房地产这个单独行业作为凸显政绩的抓手，如果仅仅满足于依靠区位优势来带动房地产业爆发式增长，那么，反而会让协同发展的效果大打折扣。

近日，河北省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关于保定等地区承接首都部分功能、北京周边地区产业规划等问题做了相关表述。这一意见的出台引起了房地产等领域的“躁动”。房地产市场对于政策的敏感性很有可能会透支市场预期的风险，而北京周边地区房价的快速变化也在告诉人们，京津冀一体化出现的“房地产化”苗头和趋势不容轻视，根本的应对策略就是地方政府一定要遏制住房地产兴市的冲动，千万不要以为京津冀一体化就是房地产化。

破除“中南海来电”的魔咒

王钟的

对很多企业负责人和地方干部而言，“010”开头的电话对他们像一个“魔咒”。一些“来头很大”的骚扰电话，或是搞推销，或是邀请企业参评奖项，或是发出各种高端培训、研讨会、考察的邀请，甚至自称新闻单位要搞正面有偿新闻、收负面“封口费”。苏北一位副县长在担任乡长时，还接到过所谓“中南海的邀请”。（《新京报》3月30日）

几乎每个人都接到过带有商业目的的骚扰电话。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愿意接听直接挂掉就是，不会遭遇什么损失。可是对地方官员、企业负责人来说，来自“北京”的电话则成为了烫手的山芋。不接，说不定对方来头的确大，可能还真会错过商机与政治机遇；接了，多半对方会提供一项有偿“服务”，而且不好随意拒绝。正如睢宁一位接受采访的地方干部说：“关键就是很难分辨真假，对我们基层单位或者企业而言，可不想得罪部委办局，万一真是哪个部委的下属机构呢，万一真和哪个领导关系很铁呢？”

首都来电难辨真假，其实隐含了地方官员、企业家的内心疑问：如果是真的怎么办？尽管国家部委的直属机构不太可能随便打电话给县官、乡长提供有偿“服务”，但是，一些组织和机构通过某种关系，挂着国家机关的名义，到地方上招摇撞骗依旧让人防不胜防。一些中央部委宣称自己是“被挂名”、“被组织”，却依旧逃脱不了那些骗子机构与某个部门领导拉上关系的可能。在人情复杂的权力场中，骗子们只要有跟掌权者一点点的牵连，也足够让基层人员担惊受怕老半天。

其实，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害怕的当然不是某个听起来“高大上”的机构，而是这些机构得以立足所恃的权力。“跑部钱进”仍然是很多地方获取发展资源的畸形方式，地方官从政路上的一大核心命题，还是怎么跑进中央机关的办公室。“中南海来电”哪怕听上去再不靠谱，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就可能得罪电话线那一头的权力。当然，拒绝来电要求真要得罪某个领导干部的可能性，其实可能性并不大，可是一旦得罪，一旦真的遇上了一点点“溢出”的权力，就会让很多“跑部”心血付诸东流。于是，在权力的威慑效应下，“010”开头的电话就成了说不清楚的魔咒了。

要让地方官员、企业家真正摆脱“010”的魔咒，还是要规范那些中央机关的权力，消除李逵和李鬼们的狐假虎威。对中央机关来说，不仅要有透明态度列出一份属于自己的权力清单，更要有政治智慧削减手中所握权力清单的条目。只有让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不怕京城的衙门，不用担心会有“京官”给自己穿小鞋，简政放权的目标才谈得上有明显成效。

明确和完善地方治权是遏制中央机关“权力溢出”的重要方式。规范地方治权，除了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外，地方企业也应当有机会享受到放权的成果。这不仅体现在办理一个商业项目，减少许多没必要的手续与限制，也体现在企业家不再担心所谓“中南海来电”的底气上。

串　门

近日，网友“Evil m0”通过微信公众号，晒出一个劫持路由器的案例，详细描述了如何攻下隔壁“女神”的路由器，从而黑进其电脑、手机。（《新京报》3月31日）

漫画：徐　简

给强拆官员起绰号，管什么用

惠铭生

近年来，因征地而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屡屡进入公众视线，一些暴力拆迁事件背后，有着事关开发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一些地方官员因强拆而获绰号，如“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耿拆拆”……（《京华时报》3月30日）

因在成都大力推进拆迁而被坊间称为“李拆城”的李春城；被老百姓称为“季挖挖”的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孙善武在担任洛阳市领导时，被群众称为“孙善扒”；时任普洱市委书记，将“同意搬迁大大地好，不同意搬迁大大地坏”语录挂在嘴边的“拆迁大佐”沈培平……这些绰号背后，透露出当地市民强烈的愤懑与怨气，也折射出百姓权利的贫困。

按理说，一座城市该不该挖、扒、拆，怎么挖、扒、拆，其决策的程序应该是先征求民意，再走集体决策，甚至要走人大程序进行审议，但为什么某些地方有时一个市委书记或市长，就能决定一座城市建设与管理的走向？只能说，“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这样的官员权力过大且不受任何约束，百姓的权利则过于式微、贫困。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会张狂，甚至会吃人。

多年来，一些地方不仅上演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雷语”，也上演了“极尽能事”的拆迁悲剧，令人一再错愕。譬如，“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强拆是我们在全世界牛X的资本”；“不强拆，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雷语”折射出一些官员已习惯于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每每先声夺人地强调这样一个行政理念——强拆有理、强拆有利；凡是反对拆迁的，就是社会经济的“绊脚石”，就是对抗政府。

至于拆迁悲剧，更是触目惊人。强拆的闹剧，将一些被拆迁户的权利、法律的尊严一次次碾压。或许有人认为，拆迁横行的根由有二，一是畸形政绩观在作祟，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有关；二是，暴利驱使。一些暴力拆迁事件背后，有着事关开发商、地方政府的暴利作祟。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性与民意、法规政策束缚不住个别官员强拆的手，其根源在于违法乱行政几无成本。在层层政绩渴求的时代背景下，一级级地方政府几乎都对土地财政有着天然的渴求，对GDP数据有着本能的追求，所以，同级和下级有违法拆迁行径乃至强拆出愤怒的民意时，涉事官员往往不仅少有被问责的，反而会被认为“有魄力”、“有作为”而被包庇甚至提擢重用，像“季挖挖”、“孙善扒”、“李拆城”皆是，都是在民意的怨怒中不断升迁，而他们的倒台，却的确与曾经的强拆并无直接关联。

可见，杜绝强拆，问责强拆官员，关键还在于还权于民，让百姓的权利坚挺起来，有资本去对抗混乱行政的权力。否则，即便被拆迁户手持宪法，肩扛国旗，也无法阻止推土机的肆虐。

马拉松式“惠民工程”怎么过的审计关

邓海建

“规划周期较长、体制没有理顺、资金短缺。沣河森林公园是咸阳市从城市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考虑的，当时公园地处西安和咸阳的交接处，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这是陕西咸阳市城市建设管理局负责人的解释。位于咸阳的沣河森林公园经过多年建设，公园大门仍旧紧闭，而这位负责人所说的“长期工程”，竟长达七年！市民想进去看看，被公园门卫拒绝。（中广网3月31日）

一座公园，建了七年，看样子离竣工还遥遥无期。门庭紧闭，生人勿近，宁可荒着废着，也不让市民一窥究竟。这是弄成了烂尾工程，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官方说法，当然比较“官方”：所谓周期较长，七年无果，建公园堪比建航母？又或者即便难度很大，哪怕建设周期长达七十年，总要有个固定周期吧。至于体制没有理顺、资金短缺的问题，又怎成了摆上台面的理由呢？既然没理顺，早干什么去了？一个先后投资6000万元的惠民工程，对西部地区来说，恐怕不算小数目，难道不应该是“先规划后建设”、“先论证后实施”、“先预算后开工”吗？

惠民工程成了马拉松工程，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事情，当然从来不是只此一家的传奇。据3月29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陕西省兴平市阜寨镇的一位村民称，“我19岁的时候这座桥就开始修了，现在我都33岁了，孩子都4岁了，桥还没有修好。”这桥名叫“兴户渭河大桥”，是2000年兴平市政府的招商引资项目。按合同规定，一年半时间建成，但由于承建企业融资出现问题，工程进度一拖再拖，最终搁置了14年。至今，当地两个县市的群众来往两地，仍得多花一个多小时，多走20公里路。往前看，去年，媒体也曝光了地跨安徽、河南两省的方集洪河大桥，建了10年，早在2006年就完成桥身建设，至今断头大桥依然未通车，而两岸居民仍旧靠摆渡过河。

公园是投了钱的，大桥是批了地的，就这么闲置着，于公共资源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浪费。财政花钱也好，政策批地也罢，民生工程频频烂尾，而且一拖就是好几年、十数年，如此明目张胆的权力之殇，何至于无人问、无人管？规划上的问题，规划该担责；企业的责任，法律可以开罚单……工程难以为继，总能找到“相关责任人”。不说舆论监督，也不说沸反的民意，即便从体制内部的审计监督来说，这些马拉松式“惠民工程”，是如何逃过专业问责的法眼的呢？

“惠民工程”烂尾，似乎年年都在被热议，但又年年烂在那里。一批烂尾工程还没收尾，新的烂尾项目又已开足马力。说到底，无非三个原因：一是缺乏离任审计，地方领导走马观花，各个都要“大手笔”，另起炉灶，干不完也能拍拍屁股走人；二是将“惠民工程”视为政绩工程，只要开工率，不管性价比，大刀阔斧一阵风，不管能否撑下去；三是举报监督机制失灵，面对明晃晃的烂尾工程上的乱作为甚至寻租猫腻，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管，放任着权力公信的断裂。

年年有审计，但马拉松式“惠民工程”年年在眼皮子底下顺利过关，真相不言不语，莫非等着谣言领跑民众对权力作为的体悟与观感？

自由谈

大国外交起步

邓聿文

大国的外交并不等于大国外交，判断大国外交的一个标志就是，其外交是谈别人的事，谈世界的事，而不是谈自己的事。现在，中国已经积累了雄厚的大国外交的经济硬实力，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比过去大为增加，已经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和解决那些涉及地区、全球和人类发展与和平的大事。

尽管中国政府确立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针，但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外国感受到的却是中国日益强硬的外交姿态。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包括刚结束的两会上——多次向世界表示，中国核心利益不容侵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去年11月23日宣布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范围涵盖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定，不仅是针对日本的反制措施，有学者认为，它也是中国对美国主导的东亚旧格局，所发起的一次空前无畏、空前有力的挑战，是对美国反应模式和反应能力的测试。中国此举所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中国正在崛起，这个进程还在持续，美国必须承认和习惯；中国有勇气和能力反击美国发动的围攻，再也不会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不会放弃主导亚洲事务的天然权利。

在中国的大国外交中，经济因素及内涵出现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外交为经济服务，变为经济服务于外交。一般来说，经济提供了外交所需的资源，而外交的目的，总是促进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中又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最大化。中国在过去30多年，外交主要是为经济服务，不但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直接介入和参与引资和引智的具体工作，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很大程度上可称之为经济外交。

今后，中国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本质不会改变，随着中国利益向全球扩散，外交更要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外交服务于经济的具体内容有变，过去更多的是招商引资，自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后，外交今后更多的是保障能源安全。目前，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全球第一，占到所消费石油的60%，未来这一比例还会上升。中国石油的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因此，保障中国的石油安全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

另一方面，中国也从过去的资本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在吸收外资的同时，中国也向外投资。最近10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即FDI的增长率和总额两项指标均急剧上升。统计显示，从投资存量看，中国的FDI2003年为330亿美元，2011年升至4247.8亿美元。从投资覆盖情况看，截至2011年，中国的FDI已经辐射到全球17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占89%。从直接投资对象国看，大部分集中在邻近中国的亚洲经济体。从投资企业的数量看，亚洲居首，欧洲次之，非洲居第三位。如何保障中国企业顺利地走出去，以及中国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对中国外交是一个新的考验。

正因为外交服务于经济的内涵有本质变化，中国才需要利用市场和消费的力量，去实现过去不可能实现的一些外交任务。在引资阶段，经济的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外交受制于经济，但在中国成为能源主要买家，以及中国资本走出去寻找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买家的市场地位和资本力量，可以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手段，为特定的外交目的服务。例如，中国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就通过所谓新的丝绸之路计划，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开路先锋，将中亚国家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捆绑在一起，把中国商品和市场力量投射到中亚国家，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紧紧同中国联系在一起。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中国还会利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参与全球治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庞大的市场和消费力量，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硬实力。相信中国会利用好这张牌，来达成自己的外交目标。2010年，中国就曾对日本暂停出口稀土以作为一种惩罚。这也是中国外交趋向强硬的一个原因。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外交的表述有以下几个重点：一是中国不会轻易改变和平发展道路和对外开放战略，但同时会加大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保护，包括维护中国公民和华人海外合法权益。这说明中国并不担心同一些国家发生小规模的摩擦和冲突。二是全面推进周边外交，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但强调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开历史倒车。三是中国一方面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又表示要深化同各大国的战略对话与务实合作，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国关系。这说明中国会进一步拓展同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加大对这些国家的利益支持，同时也不想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搞僵。四是中国会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举办国的机会，拓展大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多边事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上接1版）目前，欧洲经济开始走出衰退，出现复苏式增长。欧盟将进一步推进改革，全面增强经济竞争力。欧方感谢中方始终支持欧元和欧洲一体化，看重中国改革开放释放的新的机遇，希望全面加强对华合作。欧方愿加快欧中投资协定和自贸协定谈判，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拓展合作。欧方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发展，愿共同致力于促进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欧方愿同中方加强人文交流，加深相互了解。欧方愿同中方就非洲事务加强合作。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中欧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会谈。

“他是俺们村的好党！”

（上接1版）

朱彦夫所在的二连，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里，饿着肚子、穿着单衣裤，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敌人殊死搏斗3天3夜，全连50个人，只剩下朱彦夫自己。

他最后是被手榴弹炸倒的，弹片从左脸穿进左眼崩出。昏死过去后，又被冲上来的美国兵用刺刀捅破腹部，肠子流出体外。

后来，朱彦夫被部队发现，把他送上回国的汽车，住进长春的军医院。在长达93天的昏迷中，他接受47次手术，膝盖以下及小手臂以下被截掉，右眼也只有0.3的视力。

朱彦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出了医院，他进了荣军院，像他这样的特等伤残军人可以在这里住一辈子，让人伺候一辈子。

“肢体残废是小事，思想残废才是大事”，1956年，朱彦夫坚决要求回老家。没有军功章、只揣着一本小小的残废军人证书，一辆独轮车把他推回家乡。到了1958年，朱彦夫已能衣食自理，而且结婚有了女儿，他每月有36元的残废金，过日子不愁。“可我不能一生一世只学会进食、解便，这和个低等动物有啥区别？”他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做够一个人实有的工作量”。

朱彦夫有台微型矿石收音机，当时算是稀罕物，乡亲们闲了，就来他家戴上耳机听戏。一时间，朱家小院门庭若市。朱彦夫还用自己的残废金买了200多册图书，办了个家庭图书室。可是，乡亲们大多不识字，抱着书本只是呵呵地乐。朱彦夫就自己当教师，在村里办起夜校，帮大伙儿扫盲。

不久，他被选为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

“干部不实干、不同人民同甘共苦，就会脱离群众”

当年的张家泉村是出名的穷村、乱村，“好手好脚的都干不好，一个伤成这样的人，能当好全村的家吗？”71岁的张茂兴是当年的村大队长，他回忆说，“当初老朱当村支书，能干成啥样，俺们心里没少嘀咕”。

而朱彦夫后来显出的本事，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料，支书一当就是25年。

朱彦夫当支书时，干了四件大事：一是造田，改造1500多米长的“赶牛沟”，垫土成田。二是治山，栽植松柏、刺槐，发展果树、花椒树。千亩荒山变成“山顶松树带帽，山下林果缠腰”。三是打井，苦干一个冬天，第一口大口井竣工，人畜用水、浇地灌溉都在本村解决。四是架电，朱彦夫为了村里通上电，从1971年起，前后断断续续跑了7年，行程两万多公里，才备齐了15公里的架电材料，将光明送到村里。

当了25年支书，朱彦夫的体会是，“干部不实干、不同人民同甘共苦，就会脱离群众，不能同大家同劳动，是当不好干部的”。他总结出两条工作经验：一是，独立行动；二是，亲自到生产第一线与大家同劳动。

朱彦夫刚开始当支书，大伙儿总是说：“你只要在家坐镇指挥就得。”可他觉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定要到山上去，督促生产。但问题随之而来，只要他一露面，谁见了都要忙不迭地上前搀扶，走得远了，这里送那里接，前呼后拥一大帮。

“我是残废军人，又是干部，目标大，容易引起大家的称赞和同情……”朱彦夫觉得，这是同情也是批评。“这绝不是一般的生活细节问题，而是思想上娇气和官气的具体表现，今后绝对不能叫这种作风合法化。”

于是，朱彦夫决定一个人夜间上山检查生产。山坡并不平坦，白天走路还会骨碌骨碌滚下去，更何况是晚上。为了轻快少摔跤，朱彦夫有时干脆把假腿和双拐搁在路边，跪着走、爬着走，甚至滚着走。

第二天，小队长汇报时，他心里早就有数了。25年来，村干部没人敢糊弄他。

朱彦夫当时用的假腿，是铁皮和木头制成的，重有17斤。装上两个小时就得卸下来，走不上一里路就磨得痛。村里打井那年冬天，头顶上的热气都能结成冰霜。朱彦夫有天去工地，在外面待了3个钟头，腿由痛变麻。他感觉有点不妙，想把腿卸下歇会儿，可费了半天劲儿，用牙咬、胳膊砸、往石头上磕都不行，原来是泥水、断肢磨破流出的血水混在一起，硬是把假腿和伤腿冻住了。

赶上外出，朱彦夫的假腿一穿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假腿不能下蹲，解便成了最大的难题，为减少排便次数，朱彦夫每天只吃一点点东西，甚至吃药也是干吞。

有年去博山跑电料，为省下住宿钱，晚上他就在马路边枕着一条假腿，怀里抱着一条假腿睡觉。过路的人以为他是个要饭的。

第二天，突然赶上大雨，土路都冲垮了，汽车不能跑，只好回县里。博山到沂源有40多公里，还要途经松仙岭，山太高，朱彦夫根本上不去，他挨门挨户问，有没有独轮车。后来，他看见了一头驴，给了老乡15元，让他送。驴上没鞍，朱彦夫没手，上岭时，他顺着驴屁股往下溜；下岭时，又从驴头往下栽。过了松仙岭，他摔下来几十次，浑身是伤、浑身是土。

“传承朱彦夫为民务实的精神，把村庄治理得更好一些”

张家泉村在沂蒙山区腹地，记者去的时候，满山的桃树、苹果树还只是吐出了新芽，“要是再晚半个月，就是满山的桃花，可漂亮了。”张茂兴指着在“赶牛沟”造出的小平原说：“40多亩平展展的良田，当年增产粮食5万多斤。”

他还介绍，老朱当支书后，成立了村副业队。“村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岗，也由和尚头变成了花椒林、苹果园。俺们张家泉村，现在是远近闻名的苹果专业村，一亩苹果收入能有四五万元。”他又讲了当年如何在老朱的带领下，大搞“山、水、林、路”，在“周围几个村里俺们是第一个引来水，第一个用上电的。”

朱彦夫卸任于1982年，当时他得了肝病、胃病以及心脏病等。“这回该歇歇了！”别人都这么说他。

现在，朱彦夫住在沂源县城里，张家泉村现任支书刘文合同前几任支书一样，只要到城里，都要到老书记家中看望，请他品尝村里新下来的果子，说说村里的情况。

每次一落座，朱彦夫就扒拉开自己的日记本，搓出一张纸条交给刘文合。刘文合说，这是老书记的习惯。自从朱彦夫患脑梗塞后，思维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看电视的时候，有什么致富项目和信息，觉得村里能用上，或者自己有什么建议，他就写下来，等村里来人交给他们。“他的思维很超前，对于经济形势、农业发展等问题，总能谈得头头是道。每次去一趟他家，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收获。”刘文合说，村里的果树该换什么品种，花椒市场年内价格行情预测，老书记都有自己的见解。

在朱彦夫精神的影响下，刘文合带领的张家泉村正在进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前种粮食的梯田都种上果树。“我们这儿地好、水好、空气好，种的果子都是真正的有机水果。”刘文合说，村里产的“沂源红”苹果长相漂亮、皮薄、甜度高，是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农产品，“原来一筐苹果只卖10元，现在一个‘沂源红’就能卖10元”。

“老书记没手没脚都能做这么多事，咱健全人如果不如他、比他差，不仅脸面上过不去，心里也觉得对不起老书记。”刘文合说，自己要继续传承朱彦夫为民务实的精神，把村庄治理得更好些。